
目录

总序	王克非	ix
前言	谭载喜	xiv
第一章 翻译史学研究方法论		1
<hr/>		
1.1 翻译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
1.2 《翻译史研究方法》述评		9
第二章 西方翻译史学缘起与进程		15
<hr/>		
2.1 西方翻译史学缘起		15
2.2 西方翻译史学进程		18
第三章 史学散论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21
<hr/>		
3.1 引言		21
3.2 一般翻译著述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22
3.3 翻译理论著作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28
3.3.1 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29
3.3.2 布劳尔《论翻译》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31
3.3.3 奈达《翻译科学探索》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33
3.3.4 斯坦纳《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的 西方翻译史话		37

3.3.5	巴斯内特《翻译研究》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43
3.3.6	纽马克《翻译问题探索》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46

第四章	史学专论中的西方翻译史话	49
------------	---------------------	-----------

4.1	西方翻译“史学专论”界说	49
4.2	通史类西方翻译史话	53
4.2.1	作品基本信息	53
4.2.2	类别综评与讨论	55
4.3	国别/地域史类西方翻译史话	63
4.3.1	作品基本信息	63
4.3.2	类别综评与讨论	66
4.4	断代史类西方翻译史话	72
4.4.1	作品基本信息	72
4.4.2	类别综评与讨论	78
4.5	文学及文化翻译史类西方翻译史话	81
4.5.1	作品基本信息	81
4.5.2	类别综评与讨论	83
4.6	《圣经》翻译史类西方翻译史话	86
4.6.1	作品基本信息	86
4.6.2	类别综评与讨论	88

第五章	西方翻译史学案例选析	96
------------	-------------------	-----------

5.1	引言	96
5.2	代表性西方翻译史料汇编作品	98
5.2.1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99

5.2.2 《西方翻译理论史：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135
5.3 代表性西方翻译通史类著述作品·····	145
5.3.1 《真确的译译者：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	145
5.3.2 《译释：从西塞罗到泰特勒的语言与翻译》·····	150
5.4 代表性西方翻译国别史学与断代史学作品·····	157
5.4.1 《早期翻译理论》·····	160
5.4.2 《异界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168
5.4.3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实践：以多雷为例》·····	180
5.5 代表性西方《圣经》翻译史学作品·····	184
5.5.1 内容解读·····	186
5.5.2 作品析评·····	189
5.6 案例总结·····	192
第六章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引发的译学思考 ·····	194
<hr/>	
6.1 西方翻译史学的历史作用和特征·····	194
6.1.1 西方翻译史学的作用探究·····	194
6.1.2 西方翻译史学的特征观察·····	195
6.2 西方翻译史学与当下西方译学发展的关联·····	198
6.2.1 翻译本质概念层面的现实关联·····	199
6.2.2 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层面的现实关联·····	202
6.2.3 译者角色层面的现实关联·····	205
6.2.4 超越语言及翻译本体的外部关联·····	209
6.3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学术借鉴价值·····	212
6.3.1 借鉴价值面面观·····	213
6.3.2 “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218

结语	229
参考文献	235
推荐文献	243
索引	245

翻译史学研究方法论

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那就是做任何研究，自有其研究方法，包括做历史研究、做翻译史学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讨论翻译史学(包括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方法时，也同样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史无定法”(李红岩 2017: 5)，因为“没有哪一种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最佳进路”(屈文生 2018: 835)。当然，所谓“史无定法”，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史学有法，而且不止一种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一步谈论翻译史学研究中究竟有没有“最佳”方法或在特定时候对特定课题有没有“最适当”的研究方法之前，要对可以运用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

1.1 翻译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宽泛地说，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一般史学的研究方法相通，或者说前者可以借鉴后者。常用的一般史学研究方法包括：考据法、比较法、心理史学法(the approach of psychohistory)、计量史学法(the approach of quantitative history)以及唯物主义史学法(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ist historiography)等。所谓考据法，在一般史学研究中，是指研究者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文献材料进行

甄别、考订的方法。其使用目的在于确定资料来源是否可靠，资料本身是否可信以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比较法(或曰历史比较法)最早应用于比较文学领域，经发展后运用于其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比较历史学乃至比较译学等。史学研究中比较的方法可大体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分法相似。纵向比较法可称为历时比较，旨在对国家或人类发展的古今上下进行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横向比较法可称为共时比较，是比较在相同或相近时期内的国家、地域或族群之间的发展。通过这种“古今上下”“左邻右舍”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更准确地定位自己，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所谓心理史学法，又名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西方所谓“新史学”的组成部分。该研究方法借助和运用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原则和方法探究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并通过结合历史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气体动力学及统计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以达到提高人的历史认识能力、科学预测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目的。所谓计量史学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理论等科学和技术手段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再用分析结果验证历史的真确性，从而使结论更加精密准确和客观可信。最后，所谓唯物主义史学法，主要是指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来审视历史、研究历史，在研究中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过程中，研究者根据客观需要和条件选择各种具体做法，包括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访谈法等。当然，除用于唯物主义史学研究之外，诸如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访谈法等具体手段与做法也都是当下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常见的方法，在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乃至翻译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活动中都被采用。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借助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所提的内

部和外部研究方法 (Burke 2004/2008), 来区分翻译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知道, 内部和外部两种研究方法是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常见方法。就文学研究而言, 所谓内部研究法, 即指按照文学内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 它以语言为中心, 研究文学的内在特征, 如作品的语言特征、表述形式和文字风格等; 所谓外部研究法, 即指按照文学外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 它立足于研究文学的外部世界, 如与作品相关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同样, 翻译史学研究也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进行 (屈文生 2018: 833)。只是有一个问题: 如何界定何为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 何为其外部研究呢? 屈文生认为, 这两者的具体区分“表现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两种走向”。也就是说, 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即“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 它“通常以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为主线, 惯于使用演绎逻辑, 惯于以西方概念理论为前提, 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事件进行评判, 史料基础常显薄弱, 常举西方翻译理论的旗帜, 呈现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 (屈文生 2018: 833-834)。而翻译史学的外部研究即“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 它“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 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 惯于使用归纳逻辑, 惯于从细节出发, 研究常受某种史观指导, 力求使作品能够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 (屈文生 2018: 834)。

总体而言, 屈文生对于翻译史学方法的讨论颇具参考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翻译史学内部和外部研究法, 分别解释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 而这两种走向之间的具体区别又如上述引文中所表述的那样, 就不免会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因为人们会问: (1) 作为所谓翻译史学内部研究对象的“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 为何不可同时作为所谓翻译史学外部研究对象中的“史料”? (2) 不论是翻译史学的内部还是外部研究, 似乎都需要“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 因此为何不同样要求“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 能“使用归纳逻辑”“从细节出发”, 且遵循“某种史观”的指导, “力求使作品能够

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这样来看，以上所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翻译史学内部和外部研究在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从我们的角度看，上面谈到的这些区别其实都属于同一层面，即翻译史学内部层面。换言之，不论研究的着眼点是在“翻译人物、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标准”还是在它们所关涉的“史料、史论和史观”，也不论研究的方法是“划分为宏观方法、中观方法、微观方法三个层次或界域”（李红岩 2017：5）还是属于“微观叙事”或“宏大叙事”（伯克 2009：50；屈文生 2018：833），它们实际上都属于翻译史学内部这一结构层面，而不是分属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结构层面。

按照以上思路，笔者试对（西方）翻译史学的内部和外部这两种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我们的阐释模式。（西方）翻译史学的所谓内部研究方法，是指按照（西方）翻译史学内部结构展开研究的方法。它以（西方）翻译历史和翻译史学为中心，研究（西方）翻译和翻译史学发展的内在特质，如（西方）翻译发展史上出现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人物、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与标准、翻译策略与方法等属于（西方）翻译发展基础层面的史实，以及（西方）翻译史论、翻译史观等属于（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层面的史实。而（西方）翻译史学的所谓外部研究法，则指按（西方）翻译史学外部结构而展开研究的方法。它立足于研究与（西方）翻译历史和史学发展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如影响（西方）翻译历史和史学发展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总而言之，翻译史学内部研究的着眼点是翻译以及翻译（包括实践和理论）发展本身；而翻译史学外部研究的着眼点则是翻译（实践与理论）发展以外、但对翻译发展发生影响的外部世界，包括相关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强调：（西方）翻译史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很难、也不可截然分开的。两者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相互增强。例如，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除了分别立足于内部和外部两个主体结构外，也可从（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外部视角，来分析它的内

在特质，如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视角来分析特定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史实是如何发生的；同样，研究者也可从（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内部视角审视它的外部世界，如通过分析翻译实践和理论人物、翻译思想、翻译原则与标准、翻译策略与方法、翻译史论和翻译史观等翻译史学本体特质来了解它们如何影响相关文化、政治、思想乃至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发展。以西方古代翻译为例：古罗马时期，翻译实践的规模以及翻译方法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在古罗马翻译发展的早期，罗马军事政治势力虽已快速崛起，但此时的希腊文化仍高出一筹，因此希腊作品被罗马译者奉为至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风格的做法随之流行。比如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 c. 239–169 BCE）¹所译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480–406 BCE）的悲剧以及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 c. 254–184 BCE）和泰伦斯（Terence, c. 190–159 BCE）所译的希腊喜剧，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翻译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他们开始以胜利者自居，不再认为希腊作品至高无上，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罗马译者开始对原作随意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要通过翻译来表现罗马在知识方面的成就。对他们来说，翻译的主要目的不是“译释”（interpretatio），也不是“模仿”（imitatio），而是与原文“竞争”（aemulatio）。就是说，这时

1 有关外国人名翻译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份信息，作三点说明：（1）本书只对历史人物和已过世的当代人物标注生卒年份信息，对仍然活跃在学界的当代学者一般只以括号形式给出英文姓名，不给生卒年份，如：路易斯·凯利（Louis G. Kelly）、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等。（2）相关信息主要参照本人所著的《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及本人主译的《翻译研究词典》（外教社2005年版），原始依据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1989版）。（3）书中所涉及的年份信息，可能有一些在学界存有不同意见，读者如感兴趣，可另外查阅参考《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线上数据库（Britannica；<https://www.britannica.com>）和《牛津参考书目》线上数据库（Oxford Bibliographies；<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

的罗马翻译，既不应以希腊原文为中心，替希腊作者说话，也不应对希腊作品依样画葫芦，逐字照搬，而应当是一种创作；这种创作不仅要让罗马人的拉丁文翻译文本与希腊原作相媲美，并且如有可能，还要在表达的艺术性方面超越希腊原作，使罗马译者凌驾于希腊原作者之上（参阅谭载喜 2004/2018: 18-19）。从这个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研究者着眼于研究罗马时期产生了哪些翻译文本、翻译中遵循了怎样的翻译原则或者采用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那么该研究所运用的就是翻译史学的内部研究法；如果研究者把关注点放在与翻译史实并行的罗马与希腊政治、文化等力量的对比和较量上，那该研究就是采用了翻译史学的外部研究法。而在翻译史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这两者是相互衬托、相互交融的。

毋庸置疑，一般史学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包括西方翻译史学在内的翻译史学研究，大体上都是适用的。但从描写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在西方翻译史学研究领域，暂未见到所有一般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同时使用。较为常见或在我们看来较能有效切合翻译史学（包括西方翻译史学）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考据法、比较法以及内部和外部研究法。所有这些适用或被实际运用的方法，又都同时具有微观与宏观或具体与抽象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在（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虽然我们的确“无法避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惯性和资料简单罗列的研究惯性”（屈文生 2018: 833），而且有时也“只能停留在最表面最基本的资料陈列的层次上”（王宏志 2013: 32），但也无须，且无充足理由反对这么做。既然大家都认同“史无定法”、翻译史研究并无绝对意义上“最佳进路”的观点，也就不宜笼统地、不分语境地排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当目标读者寻求的是具体的翻译史实，希望自己能直接感悟或对它进行例行解读，那他们为何会不喜欢“百科全书式的”、以简单内部研究方式“陈列”出来的“资料”呢？同样，如果目标读者希望从某种“宏大叙事”或“哲性

思考”层面来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或了解他人如何认识和解读相关历史，那他们就自然希望能读到非“简单罗列”并综合运用外部和内外研究方法的作品。因此，在特定语境下，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是符合特定目标或特定需要的最佳方法——这就是我们在方法论上所提倡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辩证思维模式。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考据法和比较法两个翻译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谓翻译史学研究中的考据法，即指搜集与考订翻译史实或翻译史料的方法。这里的翻译史实或翻译史料，当涵盖翻译实务与理论两个方面的材料，其中翻译理论既包括译者或理论人物对翻译问题的理论阐释，也包括译学历史人物对翻译历史或史学问题的历史评论。因此，本研究提及的翻译史学或翻译史实考据法其内涵大于皮姆的“翻译考古”之法，因为皮姆的“翻译考古”，主要是指对翻译实务的考古，而非对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史实研究等全方位的考古。用他自己的话说：“翻译考古指的是一套话语体系，它用以全面或部分回答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即‘什么人翻译过什么、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产生过什么作用？翻译考古的工作可包括编制话题清单和展开对历史上诸多译者的传记研究等’”（Pym 1998/2007: 5）。按照皮姆的诠释，“翻译考古”仅是传统翻译史学研究其中一方面的工作，与其并列存在的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即“历史批评”（historical criticism）和“历史解释”（explanation [of history]）。本研究所说的翻译史学考据法，其实是把皮姆著作中所谈的“翻译考古”以及对翻译的“历史批评”和“历史解释”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在内。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工作所倚重的“史学考据”具体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搜集与累积西方翻译史料；二是考订与甄别这些史料；三是选用与分析相关史料。其中，史料搜集与累积大致相当于皮姆认为的“翻译考古”；对史料的考订与甄别大致相当于皮姆认为的“历史批评”；而对相关史料的选用与分析则大致相当于皮姆认为的“历史解释”。另外，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任务又都各自涉及两个层级的史料处理，即直接或一手史料，以

及间接或二手、三手乃至更多手史料。关于西方翻译的所谓直接或一手史料，顾名思义，是指关涉西方翻译历史进程中出现过的人和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指西方翻译历史上对于译者、翻译理论者(即人)和他们各自实务和理论的产品，以及各类翻译事件(即事)的第一手记载。例如，对以拉丁文翻译《荷马史诗》并因此开创罗马文学先河的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c. 284–204 BCE)和对西方翻译理论传统有始创之功的西塞罗(Marcus Cicero, 106–43 BCE)其人(译者、译论者)、其事(相关翻译作品、翻译事件和翻译理论思想等)的原始纪实就属于直接或间接一手史料。关于西方翻译的所谓间接或二、三手或更多手史料，即指并非来自直接源头(如记载或转载译者、论者的最原始作品)，而是来自间接源头(如记载或转载译者、论者产品、译事活动的翻译史书、史料等)的文字记载。纵观西方翻译史学的研究现状，虽然纯粹或主要建基于直接或间接一手史料的研究所涉资料最为可靠，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其可信度也可能最高，但相关研究的效度和可行度却不一定最佳。时空的变迁，资料的遗漏，后来诠释者的视角更换和研究条件的局限(如无法获得或完全获得一手史料)等，这些都可能限制对于直接史料的使用。事实上，各类历史书籍的撰写，包括本书将要讨论到的许多西方翻译史书，往往都更多地依赖源自直接史料的间接史料，或是依赖于对间接史料和直接史料的同时运用。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是翻译史学比较法。它与一般史学比较研究法一样，是一种通过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翻译历史现象或翻译史学研究现象来验证对翻译实务与翻译理论史学认识的研究方法。具体做法包括对西方翻译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实务和理论进行横向(共时)和纵向(历时)比较，以此阐释西方各时期翻译实务与理论或思想之间的异同与传承，从而更好地认知西方翻译进程和西方翻译史学传统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特质。

我们在前面指出，本书不进行翻译史实考据(翻译史学的第一层级研

究),而是以翻译历史研究过程、手段或产品为主要对象,进行次级即第二层级的翻译史学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工作进行宏观叙事加具体分析以及内部加外部结构的有机关联式研究。这些既是本书开展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所循的基本原理和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同时也是从方法论上对本研究课题所作的总体描述。我们将运用这种多面串联的综合法,对过往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状况展开调查,其中包括调查西方翻译史学研究过程中(1)采用的研究手段及方法;(2)出现的史学活动;(3)产出的史学成果;(4)这些史学活动和成果对于西方翻译研究和发展产生的影响;(5)对于当代译学研究的影响和宏观译学价值;等等。

1.2 《翻译史研究方法》述评

在扼要讨论西方翻译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后,笔者在这里还有必要对前面所提及的皮姆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一书作进一步评论。由于该书以“翻译史研究方法”命名,是一部探讨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专书,因而对于本课题乃至其他有关翻译史学课题的研究,无论在何种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关联意义。

《翻译史研究方法》由英国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公司¹于1998年出版,它是英语译学领域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以翻译史学方法论冠名的著作,因而受到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书一出版,爱尔兰学

1 圣杰罗姆出版公司(St Jerome Publishing)1995年成立于英国曼彻斯特,由莫娜·贝克(Mona Baker)和她的先生本·贝克(Ben Baker)开办,专门出版翻译研究领域的学术著作、教材、词典、译学期刊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与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等译学书刊,出版内容和质量受到国际翻译研究学界广泛好评。2013年,该公司由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旗下成立于1836年的路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收购。无论是作为翻译研究领域专门出版社的圣杰罗姆出版公司还是收购它的英国权威学术出版社路特里奇出版公司,均对推动翻译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者迈克尔·克罗宁 (Michael Cronin) 立即在国际翻译研究期刊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9年第2期) 刊发书评, 对该书的价值予以肯定。

克罗宁在书评中指出, 历史学家的责任并非在于陈述历史, 而应着眼历史学当下乃至未来的发展。他认为皮姆正是这么一位学者, 把评说当下、推演未来看成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克罗宁在书评中提到, 他认同皮姆为翻译史研究制定的四条原则, 尤其赞同其中第四条原则, 即强调翻译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表述、处理并努力解决影响我们自身发展的问题” (Cronin 1999: 399)。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地将人们今天的身影投射在昨天, 而是要认识到, 历史研究的基点始终都应服务于与研究相关的此时此地。克罗宁十分支持皮姆的这一观点, 并因此主张: “《翻译史研究方法》对于翻译史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 是所有翻译史研究者在对历史上的翻译实践展开研究时, 都必须铭记于心的” (Cronin 1999: 399)。

克罗宁认为, 《翻译史研究方法》并非如其书名所示只是一部局限于讨论翻译史的作品。他指出, 该书的一大亮点, 是皮姆在书中把交互文化性 (interculturality)¹ 视作构成译者身份特征的一个本质属性, 并强调译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人文主体性。按照皮姆的观点, 译者作为人文个体, 其内在特点在于: 他们需要生存, 也可能受到伤害, 而且更重要的是, 译者会到处走动。如果把国家翻译史置于首位, 那么就容易忽略或缩小化译者人生中的这种“游牧”特质, 容易将译者的动态活动进行静态解读, 这些都是对译者主体性的偏离。而译者作为穿梭于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旅行者, 往往既是文化差异的建筑师, 也是交互文化糅合特质的表现者。他们的职责逐渐从语言层面的中介转为交互文化层面的调停。未来翻译研究的重心也将随之转移到翻译活动的交互文化属性上来 (Cronin 1999: 399)。

1 亦译作交汇文化性、交叉文化性、跨界文化性或居间文化性等。

克罗宁还对该书的其他特点作了评述,如书中清楚地描述了翻译史研究可以采用怎样的方法,并以作者本人的研究实例来印证方法的可行性。此外,克罗宁还特别赞赏皮姆对于翻译史研究所展现出的激情,他认为对有志研究翻译史的人来说,该书能起到“激励和开导”(Cronin 1999: 399)的作用。皮姆还在书中就翻译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提了很多根本性问题,因此这本书也是一部引发研究者对译学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理论性著作,而不仅仅是一部“供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学生使用的上乘入门读本”。

200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翻译史研究方法》纳入“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在中国内地出版。香港理工大学的李德超博士为该版撰写了导读,对该书内容从前言到正文(12章)都逐一作了详细介绍,对中文读者非常有帮助。同时,李博士对该书的特色也作了充分肯定,对其整体学术价值更是赞美有加。他认为,皮姆这部著作“阅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实用性、指导性强”,“本书的前半部分相当于一本翻译史写作教科书,当中讨论的均为非常实用而又在普通翻译专著上不易见到的专题(如怎样编纂目录和如何运用频率曲线来论证假设等等)”(李德超 2007: xiii)。由于“此书内容编排得当,讨论问题深入浅出,且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出版后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有学者特意在权威的翻译研究杂志推荐此书¹,认为此书不仅是一本翻译史研究和写作的案头必备书籍,且对有志于翻译史研究的研究生而言,更是一本‘绝佳的基础、入门书籍’”(李德超 2007: viii)。

当然,在充分肯定此书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书中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对于这些问题和缺陷,克罗宁和李德超也有所评述。概言之,克罗宁认为该书存在三方面的不足:(1)在讨论译者人文主体性

1 李博士此处所说,笔者相信是指本书在上文讨论到的克罗宁在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9年第2期)上所发表的书评中的内容。

和交互文化性的问题时，皮姆忽略了翻译中的性别问题。近年来，人们在讨论翻译的交互文化属性时，往往都会关注翻译主体的性别问题，学界亦出现了不少深具意义的研究成果，但皮姆未把这些成果纳入讨论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缺陷。(2) 皮姆的某些观点及其论辩风格，导致书中不少地方表述不够严谨，值得商榷。例如，为了与其翻译史研究中强调译者主体性的观点相匹配，皮姆在书中始终反复使用第一人称“我”或“本人”，如单单第117页一页这样的称谓就出现了十次之多。另外，通篇行文在语气上更像是口头表述，而不像是书面讨论，文字中还不时夹插着平常的比喻和自传式的范例。这样的风格虽然简洁易懂、不装腔作势，但是否适合用来讨论相关的专业话题，仍然值得商榷。(3) 皮姆有时对其他学者或他人译学思想的批评过于尖刻，有欠公允。例如，皮姆在书中(第198页)讨论劳伦斯·韦努狄(Lawrence Venuti)的观点时，批评韦努狄主张“由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进行‘高尚的(翻译)干预(magnanimous intervention)’……”，“这种混合主张令人感到奇怪，使我想起大学本科时期的比较文学¹。没有任何东西证明，译者需要进行这样的‘干预’”(Cronin 1999: 400)。克罗宁毫不客气地指出，尽管皮姆对韦努狄提出这种批评，他自己却未能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抨击是有根据的，而只是摆出一副对别人思想不屑一顾的姿态。克罗宁认为这样的姿态对学术研究并无帮助。李德超对于皮姆的批评(见李德超 2007: xiv)，大体上与克罗宁的意见相同，或者说李德超的批评主要是对克罗宁所提批评的概括和延伸，因此这里不作重复。

无论是上面陈述的克罗宁、李德超的评论与批评，还是他们各自书评中提及的其他评论与批评，都有其道理，对这些观点笔者基本认同。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这二位学者的评论也有不够准确到位的地方。其

1 此处皮姆当指比较文学课程，且克罗宁还在书中提问“...(is the word ‘course’ missing?)”。

主要表现是，他们对于皮姆著作最本质的特点和缺点的评述都不够中肯，或者说他们的评述都偏离了核心。在笔者看来，皮姆著作的最本质特点，并非如他们所言，是一部关于翻译史研究的“上乘入门读本”或“绝佳的基础、入门书籍”。笔者在阅读后的第一印象，乃至第二、第三印象，都并未感受到作为一部关于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书，它的实用性和指导性有多么强。虽然该书前半部分的章节或多或少地涉及该书的研究主题，其内容与该书的标题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但除第一章“历史”（History）之外，从第二章至第六章，即“重要性”（Importance）、“清单”（Lists）、“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s）、“频率”（Frequencies）及“网络”（Networks）等各章，没有哪一章算得上直击翻译史或翻译史研究方法的话题。至于书的后半部分第七至第十二章，即“规范与系统”（Norms and systems）、“体制”（Regimes）、“缘由”（Causes）、“译者”（Translators）、“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与“交互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则更是缺乏与翻译史学方法论的直接关联。

毫无疑问，无论从这样的话题层面，还是从书中内容及其实际论述的层面来看，该书都更像是一部较深层次的翻译理论性著作，而非翻译史学方法论著，至少从下文即将讨论的几个常见方法的角度来看，即是如此。或许，我们仍可借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克罗宁的评述，换一个角度，调整一下话语重心，并对相关文字进行适当改写，便能恰如其分地道出此书的本质特征：从表面上看，该书书名及前半部分的章节似乎尚可称得上是关于翻译史研究方法的论著，但纵观全书实质内容就会发现，该书实际上只是以翻译史方法论作为切入点或吸引点，就翻译理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提出根本性问题，因而该书是一部能够引发研究者对译学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的理论性著作，而不是或不完全是介绍如何开展翻译史学研究的指导性著作，更谈不上是“供从事翻译史研究的学生使用的”入门性质的“读本”。如果学生读者（包括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希望通过此书去学习和掌握开展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他们恐怕要失望了。

假如我们按其实质内容和论述方式，用通俗语言给该书拟一个更为适切的书名，那么与其说像原作者皮姆那样将它称为“翻译史研究方法”，倒不如将它更名为“译学话题面面观——从翻译史方法说起”或“译学理论话题——兼论翻译史学方法”更为合理。这么一来，该书实质所写便更加趋同于书名所许，慕名而读的学生们或许不致读后太感失落。

前文讨论的种种翻译史学研究方法，包括皮姆书中论述的方法，对于本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作用。虽然本书重点所在是对西方翻译史学进行第二层级的研究，但即便在这一层级，也须把考据与比较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手段。只不过，这里的所谓考据，不是指对(西方翻译的)基本史实进行考据；所谓比较也不是对(西方翻译的)一手史料进行比较。如前所述，第二层级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是指对西方翻译历史研究的研究，是一种(西方翻译)史学史的研究。因此，其所涉及的西方翻译的史学考据，是指对过往西方翻译史学状况展开调查，考证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中研究者采用过怎样的研究手段及方法，出现过怎样的史学活动，产出过怎样的史学成果，这些史学活动和成果对于西方翻译研究和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对于当代翻译研究又有怎样的影响和译学价值，等等。而所谓(西方翻译)史学比较，则指对过往各种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活动与成果进行比较，尤其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方法等层面进行比较，挖掘各种已有史学活动和成果的研究特点及其所产生或所能产生的译学影响和价值等。

落实到具体做法，本书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1)对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发展史进行宏观层面的梳爬整理；(2)从过往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成果中选择八个具体案例进行微观层面的赏析品评；(3)对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历史意义展开讨论；(4)对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包括国内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展开讨论；(5)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总结。

西方翻译史学缘起与进程

2.1 西方翻译史学缘起

在任何翻译传统中，翻译史学从来都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若要探究翻译史学缘起何时或何地，我们也有必要对翻译研究本身的发展有所了解。所谓翻译研究，即指对于翻译活动(包括这一活动的过程、结果、指导原则、操作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一切话题)的理论关注和探究。虽然前面说到，宽泛意义上的翻译活动，其发展历史如同语言一样悠久，但这无疑是针对翻译实务而非翻译研究(翻译理论)而言的。诚如路易斯·凯利(Louis G. Kelly)所言，“假如翻译依靠理论而存在，那它在西塞罗之前很久就已消亡”(Kelly 1979: 219)。凯利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一个人们一般不会否认的道理，那就是翻译实践并不依靠翻译理论而存在。但如果换个角度来解读凯利上面这句话，那么其实他也是在说，西方的翻译理论起源于西塞罗，起源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由西塞罗开篇的古罗马时期。当然，这指的是较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理论，即翻译家或翻译思想家对翻译问题展开讨论时所说的(理论)话语。而从更宽泛的层面看，凡涉及翻译活动的任何话语，只要不是翻译实践本身，实际上都应归属于翻译理论的话语范畴。比如，就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传统而言，《礼记·王制》中有一段有关翻译的名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

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还有《周礼·秋官司寇》也有一段对于何为“象胥”（即译员或翻译官）的解释：“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虽然这些内容并非出自翻译家或翻译思想家之口，但把它们归为翻译的理论性话语却是恰当的。同时，由于这两段文字或可分别视为我国传译（翻译）起源与译员地位最早官方认定的历史记载，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可归为翻译史学话语。同样的道理，宽泛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其实并非起始于西塞罗，而是始于西塞罗之前四百多年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c. 484–425 BCE）或前言所提《旧约·尼希米记》关于公元前397年（或公元前445年）利未人翻译行为的叙述（Nida 1964/2004: 11）。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评论希罗多德与翻译理论的关联时指出，尽管希罗多德并未谈论过我们常说的那种翻译理论问题，从未告诉过我们应当如何翻译，甚至从未谈论过何为翻译，西方历史（包括西方翻译史）也因此从未将他与翻译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希罗多德在其史学名著《历史》（*Istoria*）¹一书中讨论了与翻译密切相关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它涉及“操不同语言的人如何实现思想交流的问题，并将此种交流置于强烈的地缘政治语境之中来讨论”（Robinson 1997/2006: 1）。因此，按照鲁宾逊的观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端期可从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时代，向前推进大约四百年至希罗多德时期。当然，严格地说，我们暂时没有其他理论依据去剥夺西塞罗“西方翻译理论之父”的称号，但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鲁宾逊将希罗多德有关跨语交流的话语作为西方翻译理论话语的起点，似乎也有一定道理。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希罗多德有关跨语交流的话语还是从《旧约·尼希米记》叙述利未人翻译行为的话语起算，西方翻译传统的理论发展都早在西塞罗时代之前四百多年就已开始。而在某种意

1 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写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

义上，这些翻译理论话语其实也包含了对于西方翻译历史的追根溯源，因此也可将它们看作西方翻译史学的源发之点。

换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西方翻译史学也可以缘起于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点。例如，据记载（参阅谭载喜 2004/2018: 14-15），公元前2世纪，有一位不知名的犹太人曾写过一篇书信体文章，后定名为《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文中记载，在公元前3世纪，耶路撒冷大祭司以利亚撒（Eleazar）应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弗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 308-246 BCE）的请求，派译员去古埃及亚历山大城承担《旧约》的翻译工作。按照托勒密二世的旨意，公元前285年至249年间，有72名犹太学者云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从事这项翻译工作。据传，这72名学者来自12个不同的以色列部落，每个部落六人。他们来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后，每两人一组，在36处地方进行翻译，译出36篇彼此极为相近的译文。最后，72名译者集合，对36篇译稿进行对比检查，在定本的措辞上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定本称为《七十子文本》（*The Septuagint*），又称《七十贤士译本》或《七十子希腊文本》¹。

上述《阿里斯狄亚书简》撰于公元前2世纪，它记载了与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相关的翻译史实，并详细描述了当时《圣经》的翻译原则、方法和程序，因而成为古代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从翻译史学的角度看，它既是西方最早的《圣经》翻译理论话语，更可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最早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关于西方《圣经》翻译的史学作品。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其他早期表现，还可从古代西方翻译理论家的作品中找到。例如，西塞罗、斐洛（Philo Judaeus, c. 30 BCE-50 CE）、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65 BCE-8 CE）、昆体良（Marcus Quintilianus, 35-96）、哲罗姆（St. Jerome, 345-c. 420）和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1 下文将该译本统称为《七十子希腊文本》。

354–430)等西方译学先贤，他们在各自有关翻译的话语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议论过西方发展史上曾经出现的翻译史实，包括与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相关的史实，如西塞罗谈论与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Gnaeus Naevius, 270–c. 200 BCE)齐名的古罗马翻译家、“罗马文学之父”恩尼乌斯如何翻译写作，哲罗姆在其书简中谈论他如何信奉译学先辈西塞罗的翻译原则和方法，等等。虽然这些早期话语只是议论过往翻译实践或理论的零散言辞，但这样谈论过往或讨论前人的话语既具有一定的史学话语特质，也具备一定的史学研究价值。基于这一考虑，本书拟在第三章用一定的篇幅来对这样的话语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2.2 西方翻译史学进程

按照上节陈述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认定，西方翻译传统中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作为西方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并随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而发展。就是说，上述《阿里斯狄亚书简》中记载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翻译史实，既可作为西方翻译历史资料，也可作为西方翻译研究记录。同样，鲁宾逊所提及的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最早理论话语——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于公元前5世纪在其史学巨作《历史》中有关“操不同语言的人怎样实现思想交流”的话语，以及奈达所提及的《旧约·尼希米记》有关公元前397年(或公元前445年)利未人翻译行为的叙述，也都可以在宽泛意义上被同时视为西方翻译史学和西方翻译研究发展最早的资料。

当然，以上讨论内容仅仅标示西方翻译史学发展的缘起，而且也只是某种意义上的西方翻译史学缘起。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抑或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翻译传统的发展历史都无一不是如此：先有翻译实践

的发生，而后导出实践者或思想者对翻译活动及其产品与过程特征发表的只言片语，再又导出思想者对翻译问题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加连贯的理论探究。这样长期演进和发展，直至今时今日，使翻译这个“(身份)原本相当低微”的概念，“一跃向上，成为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一个明星语汇与概念”(Steyerl 2020)，而与之相关的这门研究(翻译研究或翻译学、译学)也最终演化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作为翻译研究组成部分的翻译史学研究(包括西方翻译史学研究)其发展进程也自然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这一进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笼统记载先前译事活动，即上面提到的宽泛意义上的过往翻译(早期指跨语言文化的口头交际形式)或译论(早期指类似于希罗多德口中关涉跨语言文化交际活动的话语)；

2) 后来者对于过往翻译实践或思想活动开展叙述或引评，如《阿里斯狄亚书简》对于《七十子希腊文本》翻译史实的记录、西塞罗对于先期古罗马翻译活动的叙述或议论、哲罗姆对西塞罗或所有后来人对前人翻译思想与方法的借鉴和引用；

3) 研究者逐步细化、逐步深入地展开专门的发掘与书写，包括一般翻译著述的西方翻译史学章节(Bassnett 2004: 45-78; Newmark 1981/2001: 3-18; Nida 1964/2004: 11-29; Steiner 1975/2001: 248-311; Tytler 1790/2007)以及撰写西方翻译史学的专书和史料汇编(AMOS 1920/1973; Grant 1961; Thomas Steiner 1975)；

4) 以(应用)译学分支学科的身份，涌现出更多、更系统的西方翻译史学研究成果(Berman 1992; D'Hulst 1990; Ellis 2008; Gentzler 1993/2004; Kelly 1979; Lefevre 1977, 1992; Orlinsky & Bratcher 1991; Renner 1989; Robinson 1997/2006; Schulte & Biguenet 1992; Venuti 1995, 2000/2004)

西方翻译史学研究的进程反映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由零散到集聚、由随性到系统的符合整体翻译学发展规律的发展概貌。因此可以说，西方翻译史学研究，连同作为西方翻译研究主轴的西方理论译学研究，通过不断扩大其自身研究范围、不断更新研究视角和方法，与包括中国译学研究在内的世界其他翻译研究一道，为译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